

前 言

人为地将历史划分为一些片断会造成一些缺憾，但对某个时间范畴进行研究时，人们仍旧习惯于这样做，因为，这样无疑会为我们评价某个特定的年代提供帮助。

20世纪远去的钟声即将响起。这是俄罗斯与中国持续四个世纪之久的关系史上的又一个百年历程。对中俄两国中任何一国而言，这个世纪都是一个努力摆脱落后、实现现代化、积极向发达国家行列跨进的世纪，是一个实现历史必需与历史必然的转变的世纪。鉴于自身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选择了革命的而非改良的发展道路。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两国有共通之处。此外，对于我们这两个同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边界线（基本上为陆界和河界）的两个伟大的邻居来说，这又是一个双方曾经克服过、现在仍在不断克服着主客观的巨大差异从而相互适应的世纪。

在国际大环境以及俄中两国各自的小环境下，尤其是考虑到两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20世纪末期两国关系的本质内容及其特殊性加以关注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还存在不少可见的或不可见的现实困难，但在下一世纪的入口处正展现出逐渐改善两国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前景。

现今，在俄中两国中断往来达十年之久这种不正常的状态

结束之后，首次出现了以各种形式重建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的可能性，其中既包括俄罗斯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也包括俄罗斯与中国台湾岛的关系。

无论从哪种涵义上来说，这都是一种新型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有着众所周知的历史积淀，但它同过去的那种交往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毫无共同之处。

据此，有必要对下列问题加以分析：

现在的俄罗斯的邻居——中国是怎样一种情况；

如何发展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莫斯科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关系的特殊性表现在哪里。

莫斯科——北京：第一阶段

俄罗斯的邻居——大中华民族

俄罗斯的邻居是大中华民族。我们称自己东南方的伟大邻居为中国（Китай），称它的居民为中国人（китайцы）。当我们这样称呼我们的邻居时，在那块国土上顺序更替的历朝历代以及现存的政权意义上的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对我们而言似乎并无区别。对我们而言，它们都是“中国”（китай）。从这一意义上讲，历朝历代以及现存于这块国土上的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的公民或居民的民族性的区分也并不重要。对我们而言，他们都是中国人”（китайцы）。

我们的人民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语言聪明地表述政治现实和历史现实。他们抛开表述对象的朝代更替而将其历史称呼作为一个特定的、独立的概念剥离出来；同样地，他们抛开表述对象的具体的民族属性乃至其地域属性不谈，而将其居民的广义的称呼作为区别于邻国及邻国居民的共性的东西剥离出来。这样就使存在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个朝代、某个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的公民或某个具体的民族属性与以世界舞台为背景的，作为人的共同体的民族的总体称呼区分开来。同样地，也使具体的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的称呼与相应于其民族的自然地域意义上的国家的概括性命名区分开来。确实，在我们的语言中，中国

人即指世界民族之林中与世界其它民族并列的一个民族，而中国则可以指以世界舞台为背景，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同时、或先后建立的任一个或任几个政权意义上的国家。

于是，中国即意味着中国人的自然地域意义上的国家，而中国人就是任何政权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国家的居民。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称作中华民族。它曾经拥有过并且目前仍拥有着自己的政权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包括民族的具体属性不同的，一个或多个政权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国家的居民。

在某种意义上，民族指自然意义上的国家（*страна*）和人民，这要以国家和人民持续存在，在共同的地域上，一个政权意义上的国家取代另一个政权意义上的国家，同时，所有这些国家又都是以同一个民族的国家这一条件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被理解为一个民族的全部居民的总和。对中国人的理解也是这样。

按我们的观点，所有中华民族的政权意义上的国家，如果愿意，都有权利称自己为“中国”，同样，如果愿意，所有中华民族建立的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的居民也都有权利称自己为中国人。

生活本身以及世界舞台上现实存在的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关系要求我们必须对民族与国家的概念加以区分。这里，中华民族指的是中国和中国人；而中华民族的国家就目前而言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作者注：依据国际法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书在沿用“中华民国”这一名称时，系指台湾地方政权，因此特别加上引号。对此，务请读者注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也有权称自己为中国。

以下的讨论我们将以下面的基础作为出发点，即中国过去

存在，现在仍存在，同样，过去和现在都存在中华民族，且在其历史上建立过许多政权意义上的国家。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着不同于中国人自己的、各自不同的对中国的称呼方式。这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各国人都有适合于自己母语语音的，反映了政治和历史现实的对其它自然地域意义上的国家和人民的约定俗成的称呼方式。在我们的语言中，“中国”指的就是自然地域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某一个或多个政权意义上的国家；“中国人”指的就是自然地域意义上的国家——“中国”的居民，而非某一具体的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的居民。也就是说，与俄语中“自然地域意义上的国家”和“人民”这两个术语相对应的是“中国”和“中国人”。至少我们在近四个世纪的与这一国家交往的历史中我们是这样使用这些术语的。

汉语有自己的概念体系，这一体系肯定与我们的不能完全吻合。但在运用上述这些术语时，有时我们对这一点是加以忽略的。我们称 *Китай* 为“中国”，而中国人则有自己的另外的称呼。

在 20 世纪的最近几十年当中，在中国出现了一些全新的说明这一自然地域意义上的国家以及这一自然地域意义上的国家的人民的术语。我们仍然将此二者称为“中国”和“中国人”，目前尚未依照新的形势重新加以确证。同时，现实生活本身和近年来我国产生的新的概念都使我们最终认识到，“中国”在今天既指中国大陆，也指台湾岛，亦即现在同时存在着两个政权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国际舞台上错综复杂的关系现状要求我们要明确地将任意两个伙伴国（政权意义上的）之间的关系同两个不同民族的政权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个民族的一个或多个政权意义上的国家与

另一个民族的一个或多个政权意义上的国家或国家的一部分（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外交关系加以区分。因为外交承认问题以及建立何种形式的接触、交往或外交关系的问题都要依照相关国家间达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或谅解来具体解决。

正因为如此，有必要研究中国人今天是怎样称呼自己的，是怎样称呼自己的国家的，以及他们为这些称谓赋予了怎样的含义。

那么，“中华”指的是什么呢？

“中华”这一术语由两个词根“中”和“华”组词。前者译成俄文意为“中心”“中央”“中间”“中间的”；后者则为“繁盛”“光彩”之意。

在这一自我称谓之中充满了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与其它民族、国家（包括自然地域意义上的和政权意义上的）的对比意味。它意味着中华民族是一个繁荣昌盛的民族，在相邻民族和世界其它民族之间占有“中心位置”。

“民族”指的又是什么呢？

中文里“民族”这一术语也由两个词根“民”和“族”组成。前者具有“人民”“民族”等多种含义，后者则为“同一性”、“群”之意。

中文的“民族”主要是指人的共同体，即具有同一性的各阶层的人；指的是有共同的民族属性相联系的人的群体或共同体。

汉语从单个人的个性和人类的共性出发，认为人是由共性来联系在一起的。而构成使中国人称中国的民族为“中华民族”的原因的，是生活在某一确定的地理空间——准确地说是围绕某一没有明确标定的界限的地理中心分布（不一定是围绕

某一个点，而有可能是一个地带、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地域）这一共性。

归结起来，在中国是将具有共同的人类学特征、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生活地域，以及既具有抵抗外来民族的同化的能力，又善于同化另外的民族的人的群体归属为同一个中华民族。中国自称为中国，就如同自称为中华民族一样，实际就是暗指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在世界其它民族间的地位。

什么是“中国”呢？

这一词汇翻译成俄语意思是“Китай”或“中央之国”，汉语里的“中”即是“中心”“中央”之意，而“国”即是“国家”的意思。

同时“中”又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因而至少在当今中国，“中国”的主要含义是“中华民族的国家”。看来，中国人用这一词汇来说明中华民族或全体、或其一部分所建立的所有国家不是偶然的。

中国以外的世界，如俄罗斯，对这一国家（自然地域意义上的）、民族的称呼“китай”（丝绸之国）同时与中国所使用的“中华民族”和“中国”（即中华民族的国家）这两个用语的含义同时相关。实际上，俄语中的“Китай”（丝绸之国）同时兼容汉语中的“中华民族”和“中国”（即“中华民族的国家”）这两个概念。换言之就是同时兼容中国大陆的民族和政权意义上的国家的概念。我们所使用的“自然地域意义上的国家”（страна）和“人民”这两个术语是一个意思，而中国所使用的“中华民族”和“中国”则是另一个意思。这里存在着“人民”“民族”“自然地域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意义上的国家”这几个概念间细微的含义差别。俄文和中文中在此没有完全相对应的术语。正因为如此，对这些中国所使用的术语加

以关注，对其内容加以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中国周边的国际社会（包括俄罗斯在内）来说，“китай”（丝绸之国）——既指中华民族，又同时指众多的中国人的政权意义上的家，并且不考虑在世界历史上不同的阶段到底是由哪一个，或由哪一些国家政权（或国家构成）来代表中华民族的。

当前，在民族和历史这两个概念有着特殊意义的时候，中国为“中华”和“中华民族”这两个术语所赋予的内涵也就更显得重要了。

“中华”和“中华民族”这两个术语特别重要。必须努力去弄清它们的政治内涵，以便尽可能地、更有把握地同中国达成相互理解，更好地分析现代中国人的心理。他们的心理、或者说政治心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国家（政权意义上的）政策。

很显然，将中国使用的“中华”这一术语引入科学语体，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引入国际交往语体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与“中华”这一术语等价的词汇还有“中国”“中国的”“中国人”等词汇。

有一个概念对中国人的凝聚作用要比国家概念所起的凝聚作用还要大。这就是大家都归属同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在倒底存在着同一民族的几个（政权意义上的）国家这一问题上人们可以有所分歧，但却都赞同民族观念是联系和团结起大家的唯一因素。这一观念毫无疑问地广泛应用在涉及文化和文明的一系列问题上。同时却又在“国家”这一问题上有所争议，确切地说是在这一问题上各持己见。

这里首先涉及到的不是国家的概念，而是作为人的共同体的民族的概念，事实上中国人又都基本上属于同一民族，即汉

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暂且不去管从民族概念中分离出来的汉族人的存在和同一性问题，而只探讨他们的出生地，亦即他们生活在哪一个省份。

从这一意义出发，同民族的概念相比，国家的概念似乎是次要的。民族始终是统一的，虽然可能或暂时、或依次、或同时有一个、两个或多个政权意义上的国家来代表它。这种情况近百年来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中国，目前这种状态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另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不乏类似的情况。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体制从属于国家概念的主张，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种提法。

换句话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以此建立起一个各种概念的阶梯式的层次，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民族的概念，下面一层处于从属地位的是国家的概念，再下一层为制度的概念。很显然这里认为只有民族才是永远一致的，且是唯一的共同属性。同时也强调了，在同一历史时期，只有一个国家有权代表民族，同一民族只有一个国家是合法的。这一国家在代表民族的同时，可以同时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单元作为不同的行政单元或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归为自己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也在推行自己的概念体系，将国家概念凌架于政府的概念之上，而不提及制度这一概念。其整个概念架构如下：人，人民或民族，之后为国家，再后是政府。这一观点的拥护者们认为，人，人民和民族同国家和政府相比较无疑是应优先考虑的。在这样一种概念架构之下，政党及其思想意识形态的概念实际上要低于政府的概念。台湾有可能这样认为：一个国家可以存在两个政府，并在各自的辖区内推行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或政治制度。而对应今天的现

实政治局面，即是指同一民族即中华民族的两个国家可以同时并存。

由此可见，民族是一个团结的概念。中华民族将以一个统一的民族继续存在。它终会找到一种不影响所有中华民族人的共同生活和相互促进的存在形式。

沿这一思路进一步深入，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设想：早在1912年的第一天，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逸仙在南京郑重宣称，在他看来，只有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这五个民族和睦相处，共同缔造中华民族的幸福生活，中华民族的国度里生活的各民族才能迎来光明的未来。孙逸仙那时考虑的是创造一个“五族共和”；当时人们还认为是由五个民族的人民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中华民族。

今天，继承孙逸仙的思想，在与其不相违背的前提下，将近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考虑进去，则显然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在中国出现第三个政权意义上的国家形式（第一个指“中华民国”，第二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第三个国家形式有可能是中华联邦共和国或中华邦联共和国。同时，联邦或邦联政权只负责处理它的各成员国所自愿提交给它处理的对外政策和国防问题。而联邦或邦联的各成员国则有权自行决定自己的经济或政治体制。在政治体制（或者政治结构）方面的争议消除之后，在联邦各主体或邦联各部分自由选择自己所需的经济体制或结构之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文明礼貌的交往很有可能会对联邦或邦联范围内上述各民族的关系起到推动作用。

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不单涉及经济和政治体系问题，还涉及汉族与其它目前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生活在台湾地区的一些民族的利益分歧。

在中国，尤其是近四分之一世纪，正在大力宣传一个口

号：“振兴中华”，它可以翻译为“复兴中华”，“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国”，“繁荣和发展中国”（确切地讲，上述几种翻译方式中的‘中国’指的都是‘中华民族’）。

这是一个团结的口号，它号召民族团结。这是中华民族思想体系的核心，中国各政党的思想体系都或多或少地与这一思想体系相一致。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宣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只是中华民族整体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因此，90 年代有一首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流行绝不是偶然的，歌中唱到：“永远不变黄色的脸”。共属于中华民族是主要的团结力量。

“振兴中华”这一口号为全国人民提出了共同的目标——重振国家，使国家从发展的死角中走出来，摆脱停滞状态。这一口号中同时还表述了中国、中华民族和振兴国家等概念。

目前，重振国家意味着：第一，摆脱在中国持续了至少一百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国家、民族发展的倒退和停滞状态；第二，繁荣国家经济，增加国家财富、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提高本国家、本民族的国力和军事力量，使国际社会公认：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是一个一流的国家，最终要使大家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这一口号既反映出积极的目标，也预示着一种野心，这种野心引起了外国人的忧虑。这个口号可以使国家向两方面中的任意一面发展。

中国在本世纪多次提出过国家和人民的概念。为了使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的任务就是加强综合国力，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但是，对于许多政治家来说，问题在于首先应该做什么、首先能够做什么：是使人民富裕起来，还是增强国力。

“文化大革命”中就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就极具代表性。

以林彪、陈伯达为代表的一批走在“文化大革命”风顶浪尖上的人物，认为在当时已经基本上战胜了毛泽东所谓的国内修正主义，应该着手解决经济问题、扩大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自然而然地达到增强综合国力的目的。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想法显示出这些政治家的信心，他们确信中国已经没有外忧了，中华民族已经摆脱了最严峻的威胁，国家可以集中力量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这一意见显示出他们对人民生活状况的重视。

毛泽东反对上述观点，他认为，国家本身和人民的精神世界仍然处在严峻的威胁之中，这种威胁不仅来自公开的、表面化的主要军事敌人——帝国主义，主要指美帝国主义，也来自暗藏的、伪装起来的敌人，即苏联修正主义。事实上，对中华民族来说，苏联修正主义比美帝国主义更危险；对毛泽东的国家来说，苏联修正主义才是主要的军事威胁。要净化中国人民的精神，必须首先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只有军事上强有力的国家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毛泽东不允许把发展生产放到首位，不允许政治服从于经济和经济需要。

在中国，政治性民族和单一性民族的问题是复杂的。可以清楚的一点是汉族——是一个单一性民族，尽管它的组成部分彼此间的区别很大（尤其在语言的语音系统，语言的词汇储备等方面），但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将来也许不完全是这样），汉族的凝聚力要比他们之间的区别强大得多，重要得多。

从某些意义上讲，中华民族可以说是一个政治性的民族，在中国的领土上生活着 50 多个民族，目前中国大陆认为，所有这些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性的民族。从这一点上看，民族并不是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中心含义，这里包括历史的、政治的、地缘政治等各方面因

素。理论上讲，中华民族在地缘政治和历史方面是一个民族或者说是单一民族，但就真正的民族概念来说，它不是一个民族。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汉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绝大部分，占中国居民总数的 90% 以上。

中华民族即是一个政治性民族，同时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单一民族，在中华民族内部有一个由汉族人构成的单一民族的中心或者说是核心……它不允许外来的任何人来影响中华民族的活动和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现实政治问题在于：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代表与人口较多的民族代表在目前是否都能够感到自己是权力平等的公民？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于台湾：大多数的台湾族人，特别是那些虽然是汉族，却认为自己是台湾族人在思考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的公民还是某一个中华民族国家的公民，抑或是他们愿意区分“中华”和“台湾”这两个词汇，认为这样至少可以表示出在台湾岛有一个自主独立的“国家”？本书下文中将会对这些问题加以解答。

在大陆，一系列中华民族的标志被认为是更重要、更悠久的国家标志，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华民族本来就自己拥有的土地比现在的要多。

在此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产生了要求恢复历史上中华民族所拥有的土地的主张。中国国内一些相当有影响的力量希望最终不是依照民族的界限、而是依照历史上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地地区来划定中华民族的边界，认为只有这样做，对目前中国大陆的国家边界来说才是有利的，才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原则的。这也是现代中国相当大的一部分政治领袖的观点，这一观点并不是直接公开地表现出来的，但它总是存在的并将存在下去，目

前它只是被隐藏了起来。

中华民族统一性的问题是很复杂的，确保这种统一性要求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民族、经济、国家问题。从民族角度看，要保持民族的多样性，一方面，要使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都能够感到自己与其它人是平等的，享有平等的权力，另一方面，各民族都是自愿地成为一个国家的组成部门。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稳定和安宁。

从经济角度看，所有的民族（也可以把他们称为支民族，因为他们目前都是统一的汉族的组成部门）和他们生存的地区，都应该在统一的经济共同体中受益，都应该比分散成为独立的或是拥有相当程度自制权的经济区域中得到更大的利益。

最后，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样的统一体应该更关心捍卫全民族的共同利益不受世界其它民族的侵害，而不是保护国家内部某些少数民族的利益。

国家和国家机构应当保障作为国家居民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同时，保障他们的切实利益。首先要保障某一民族的生存、安全和民族聚居地不受侵扰，还要保障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利益，即包括它在本国的各民族关系中的利益，也包括它在国外的利益。

保障民族、经济、国家这三方面的利益都稳定、平衡、不把它们纠缠到一起也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整体稳定。目前中国大陆，在这三方面的每个环节都存在问题。

汉族人口众多造成了下列问题。汉族与世界上所有其它民族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它来说，自我保护、生存以及拥有固定区域的格式是不存在的，汉族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它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已经确立，其它民族也不会对它造成外部威胁。

汉族，做为一个民族，可以无所畏惧。此外，汉族有能力

建立自己的国家、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时也可以同样制定出中华民族的政策，使其它各民族不再注意自己民族安全问题，而是注意整个世界的安全以及国家所在地区的安全问题，也使世界上所有的其它民族确信，他们不会受到汉族的威胁。

汉族的国家政策很可能不顾许多有关国家安全、甚至国防方面的建议，公平地讲，在这方面汉族比许多、甚至是大多数的民族更可能把自己与全人类、把自己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等同起来。

同时，在汉族的个体以及群体意识中都一直在思考，世界上有哪些民族能够向汉族提出挑战，这就是美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和印度人，而他们的挑战性质也不尽相同。汉族的部分政界高层人士认为，上面所述的四个民族就是汉族在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对手。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思想不仅适用于和平竞争与共存，也适用于国家间竞赛、甚至战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判断出，中国所谓的全世界大统一、大团结、大一致以及世界大同到底意味着什么了。

现在，中国国内的主要民族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汉族主义，另一方面是国内少数民族的反汉情绪，这一矛盾长期存在，并且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央政府力量虚弱时可能会尖锐化。

目前，对中国大陆来说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国家，但是，从中华民族的某些现实特点中可以推测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不畏外敌、不必担心某人会有力量从汉族手中夺走他们民族生息的土地的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讲，不论是军队还是边界，都不会像它们对世界其它国家一样地对中国发挥作用。即使汉族将分成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在历史文化领域都是独特民族的国家，任何人也不能把自己的军事统治强加给

这个民族；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这样做，因为即便是给自己下达的这样的任务，它们也没有能力完成。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呢？这一概念是有着长期的现实基础，自然产生的，还是为了某些政治目的人为制造的？如果说这其中存在着人为因素的话，这一因素又是占了多大的比重？中华民族的存在到底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

我们认为，以下论述可以作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的确，就目前的世界政治和国家状况而言，中华民族是存在的，她的存在正如她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的作用一样不容置疑，她主要代表着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汉族的利益。

中华民族是一个超级民族，它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可能位于人之上，甚至位于民族或者国家之上。按照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解释，在中国，中华民族的概念代表着包括国际主义思想在内的许多涵义（同许多其它问题一样，毛泽东在这一方面也远远地走在了斯大林的前头，令后者不可望其项背。现在，中华民族的概念代表着一种超民族主义或思想，这个超级民族正在考虑逐渐同化、吞并世界上所有其它的民族。将来，中华这个超级民族原则上会接受任何国家或民族以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名义加入中国并把它们转化为中国这个单一民族的组成部分。同时，她不希望现在是中华超级民族一部分的任何一个民族走出自己的国界，脱离自己的控制。

总之，以上就是目前在中国国内的个人或者群体的认知领域中，大部分人对中华民族的理解，这也是中国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现行政策的基础。俄罗斯的邻居——大中华超级民族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民族问题的。

俄联邦总统鲍·尼·叶利钦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访问 延续和开端：民族和国家利益

1992年12月，俄罗斯联邦总统鲍·尼·叶利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首次访问。以思想意识形态的陈旧观念看来，这显然是民主新俄罗斯的领袖对共产主义中国的一次访问。如果以旧有的概念和陈旧的思想意识形态模式的条条框框来套用的话，是可以做出这样的评价的，但是这种判断在今天已经不再适用了，因为它无法反映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情况。我们之所以再次提及这一刻板的教条，意在使读者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今天俄罗斯与中国这两大民族在对待两国关系的观念上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标志着俄中两国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这次访问也是俄中两国人民近四百年相互交往史的延续。从这一点来说，这次访问有着丰富的涵义，历史与现实，新鲜与古老都交织其中。人们希望这次访问能够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新的前景，同时也能给解决两国间的遗留问题带来新的可能性。两国关系的新开端与延续，这两个活生生的事实既为俄罗斯总统访华本身，也为当前的俄中关系打下了鲜明的烙印。

访问过程中，两国领袖，即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无论是在谈判、交谈还是会见中自始至终都做到了摒弃主观好恶，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同时，作为各自政权体系的代表，他们又始终遵循国家的现实利益、各自政党或政治力量所固有的政治观念，遵循着各自对两国关系、本国